

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

QUYUAN DE WENHUA RENGE YANJIU

彭红卫 著

『求索』

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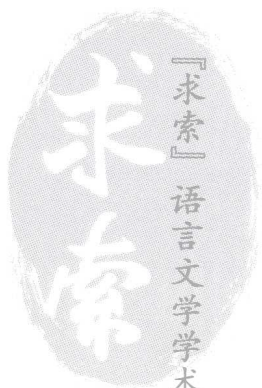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

QUYUAN DE WENHUA RENGE YANJIU

彭红卫 著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彭红卫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22-3614-6

I. 屈… II. 彭… III. 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4064 号

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

© 彭红卫 著

责任编辑:覃妩周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94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

版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三峡大学文学院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任:刘德富

副主任:李建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新	王前程	邓新华	田斌
刘月新	吴卫华	陈和春	李建国
张朔	范军	赵宏	胡绍华
段维	曾巍		

总 序

王先霈

三峡大学文学院组织出版“‘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整体地展示本院教师最新的重要学术成果，第一批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即将面世。这是他们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学院领导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构想和当前的进展，嘱咐我就此写一点文字。我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及其前身宜昌师专中文系的多位同行交往几十年，对学院的发展轨迹有所了解，可以借此谈谈我对这个学术团队的观察和由此而生的感想。

从宜昌师专所在的北山坡，到今天三峡大学的葛洲坝与三峡大坝近边依山傍水的主校区，地理距离并不远，而几十年来几代人所经历的创业历程，却是并不平坦单纯，而有着十分丰富厚重的内涵。在学科建设中，传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无形的力量，文科尤其如此。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一个学术团队不可能于朝夕间突兀而起，更难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宜昌师专中文系的老师们，是一批非常敬业的园丁，倾注心力于教学，同时也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学有专攻，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撰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带出了一批批后继学者。本丛书的作者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今正是治学的黄金年龄。他们曾分别到国内多所大学攻读学位、进修和访学，既仰承本校先行者们的纯朴作风，又广泛吸纳校外、省外和国外多种学术营养，最近十年左右，陆续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都有稳定的学术方向，从我十几年来接触，从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不难看出他们在求索之途跋涉的清晰脚印，而本文库里的专著则多是作者在稳定方向上的新成果。我比较赞赏稳步渐进的治学方式，我以为，

《荀子·劝学》说的“螭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无定向，常常导致学无定见。趋时跟风，可以煊赫于一时，最终则消歇于长久。治学首先是个体独立的精神劳作，求索者要准备着经受孤独。但这绝不是主张单兵独人各自为战，恰恰相反，在一个院系、一个专业里，大家都应有整体意识，有学术上的交流、交融和碰撞。然而，也只有各人有专攻、有特长才能有效地交流、交融和碰撞，交流、交融和碰撞必须建立在大家各自独立思考和张扬学术个性的基础之上。本文库的作者们，分属若干二级学科，就我的了解，其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力量较强，而语言类和文学类彼此呼应，有竞争更有协作。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的配合相当重要。在自然界，物种多样、结构多层的环境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在一个院系，所属二级学科既要有重点，又要有相对的和动态的均衡发展，这才有利于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各个学科和各个成员适应当代社会的急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三峡大学文学院的进步，与他们学术生态的合理是大有关系的，这套文库将有利于他们学术生态的进一步合理化。

现在看到的收入文库里的第一批著作，其学术含量彼此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也使我们可以期望，后续的作品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文库以“求索”为名，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术之路是无尽的，学者生命的价值在无休止的探求之中，最灿烂的明珠永远在我们的前面闪耀。

2007年3月26日

于武昌桂子山

序

张三夕

我与彭红卫的相识可以追溯到 2002 年。当时，我刚从海南大学调回母校文学院工作，担任了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学位课程“文史工具书与中国古典文学文献检索”的教学工作。在班上二十几个同学中，红卫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他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脸上总是黑里透红，身体结实，看上去年纪显得比其他同学大一些。课间喜欢与我讨论问题，抽烟很凶，从言谈中我得知他的导师是周禾先生，不觉对红卫多了几分亲近。我与周禾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还在读研究生时就相识，我的大学挚友何新文与周禾同门，都求学于我很敬重的石声淮先生门下。在比较看重门派和辈分的文史领域，学术上的某些“血缘”关系，确实可以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后来红卫表示要跟我读博士，我自然十分欢迎。2005 年，他经过一些周折，终于和我结成师生缘。两年来，他的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办事历练的才干，让我很满意。

红卫目前工作的所在地是三峡大学，地处宜昌，那里正是屈原的故乡。据我所知，他在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以研究屈原和楚辞为职志，其硕士毕业论文《屈原的悲剧人格研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答辩，并获得校内外评审专家余斯大、何新文等教授的一致好评，如余斯大先生认为“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前人似乎没有或很少提出过的观点，言之颇能成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他一直继续专注于屈原和楚辞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他近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

作为他的老师,我有幸先通读了这部专著。阅览一过,为红卫取得的成绩所感到的欣悦之情自不待言。为了有助于大家了解此书的内容和特色,我想似乎有如下几点可以向读者评介。

首先,在结撰策略上,这部专著体现出了一定的包容性和系统性,因而在结构上显得比较精美而厚实。

屈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真、善、美的崇高典范,其人格魅力和艺术光芒可谓“惊采绝艳”。自古迄今,从生平、思想、文学、艺术、语言、民俗、神话、文化等方面研究屈原其人其诗者层出不穷。然总体看来,微观的局部研究较多,宏观的系统研究较少。作者以“文化人格”为题,对屈原作综合研究,正是希望统合屈原其人其诗真、善、美三个方面的内涵。按照作者的理解,“文化人格是人格在心理、伦理和审美三个维度上的个性体现。本书所探讨屈原的文化人格,即屈原的气质性格、道德品格和艺术个性三大方面,尤其侧重于探讨屈原气质性格的悲剧内涵以及它们对屈原创作的影响”。这是极具概括性的。在该著六个章节中,除了第一章考索人格和文化人格的内涵和最后一章总结屈原文化人格的历史价值之外,主体部分是探讨屈原的道德人格、心理人格和审美人格。对于屈原的道德人格,作者吸取了历代学者和当代学人对屈原传统人格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屈原道德人格的建构历史和儒家在这一建构历程中的阐释策略。这虽然不是作者讨论的重点,但从反思文化的立场上看,恰恰是发人深省的。尤其是在重塑当代知识分子健康人格的今天,知识界仍需进一步探索。对于屈原的心理人格,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展开讨论,它既是该论著的重点,也是其创新之处,下面我还将专门说明这个问题。对于屈原的审美人格,作者没有泛泛讨论屈骚艺术的方方面面,而是重点挖掘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的来龙去脉、愁神苦思的迷狂心态与创作心理以及楚辞感伤审美品格的确立与延伸等三个方面,其意显然不在系统检视屈骚艺术的全貌,而是围绕屈原的心理人格来考察屈骚艺术,可以说是取舍得当。要之,从心理学、伦理学和审美学三个维度全面总结和探讨屈原的文化人格使得该论著结构清晰,内容丰富而重点突出,视野也显得非常宏阔。

从谋篇布局上,我看到了红卫在系统把握屈原人格方面的整体结构能力。

其次,在学术理路和学术方法上,这部专著具有较强的探索性。这是我想着重加以说明的。

该论著第三、四两章探讨屈原的心理人格,作者认为,“我们既要阐发他身上所具有的自信热情、志存高远、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坚贞可靠、具有顽强的毅力、执著追求理想等积极的个性品格,也不能忽视其性格中的悲剧成分,如有违中庸之道的激烈、外露、冲动、耽于幻想、自负、自恋、焦虑等消极的个性品格。所以,我们将采用文本叙事与人格分析相观照的方法,通过屈原作品,借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方法,静态地描述屈原心理人格的悲剧性成分,展示其自恋人格及其文学表现、成因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把屈原求索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动态地分析其青壮年的心路历程、中晚年的异常心理和走向死亡的屈原心理。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将着重考察其人生际遇与人格特质的内在关联,以期在纵向研究中识别屈原悲剧人格的连续性和变化维度,探寻其命运与人格发展的历史逻辑”。作者的这种写作愿望应该说在该论著中基本实现了。

作者对屈原的人格特质分析,分为静态描绘和动态展开,后者实际上也是一种描绘。好在作者没有依照理论观点的要求去作想当然的揣测(当然完全避免也是不可能的),从而满足自己论述的需要,而是尽量在作品中寻找内证,从而一方面期望对屈原的心理以及精神作出合理的描述、说明、解释、论证,另一方面,期望能解决前贤所争论中的分歧,如屈赋中的地名,一些作品的内部逻辑层次等等。作者没有从所印证的作品去作一字一句的训诂,而是从诗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上解释,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空泛地发表议论,而是通过作品本身去分析诗人的心理状态,让文本自身说话,尽量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如第三章第二节“从人格五因素模型看屈原人格的悲剧性”,作者在心理学的解释框架中,以人格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深入系统地描述屈原的人格特质和人格结构中悲剧性的层面,认为屈原在神经质、外倾性、经

验开放性、认真性上应属于高分者的典型表现,宜人性上表现并不突出甚至偏低。当屈原情感高涨的时候,在强烈的政治成就动机和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下,其认真性、外倾性、经验开放性表现得非常活跃。当屈原持续性抑郁时,在强烈的政治挫败感中,其神经质倾向明显,而宜人性偏低,二者互为因果,愈演愈烈,最终在无法摆脱的焦虑和彻底的孤独中纵身汨罗,这两点正是其人格悲剧性层面的主导方面。作者没有纠缠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品的篇数与真伪等方面的繁琐考证(这方面的深入考证估计他的功力也不够),而是从人格特质理论方面研究我国古代作家的身心,而且突破了仅仅从作家所处的时代、所创作的作品背景等并以此为总出发点对作家作单层面研究,这确实不失为一条应该重视和探索的学术之路。我们暂时撇开其结论是否正确和能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点,但就其研究方法上讲,应该是有价值而值得肯定的。

再比如说,对屈原死因的探讨,作者提出双重焦虑之说,认为在屈原内心深处交织着身份和文化的双重焦虑。屈原的身份焦虑一方面是民族身份的焦虑,另一方面是贵族身份的焦虑。身份焦虑源于现实身份的变乱和寻求身份认同的急迫。和身份焦虑相比,屈原的文化焦虑更为深重,即在感性的巫官文化和以理节情的史官文化冲突融合之时,屈原面临的一种文化选择的焦虑。身份焦虑和文化焦虑与屈原一生相伴。而屈原人格特质中又蕴含着悲剧性的内核,环境际遇则是悲剧人格的催化剂和发展土壤,所以当悲凉的人生放逐与激烈的内心冲突无力解决时,死亡就成为叩问生存价值的必然选择。这无疑给屈原的死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屈原之死,是中国最早的诗人之死,也是最能引发人们思考的诗人之死。李泽厚曾指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见《古典文学札记一则》,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我曾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一书中说过:“屈原‘预谋’了死亡,所以,当他无所畏惧地走向汨罗江,走向死亡时,他是在以自己的死来表明对祖国的忠诚,以自己的死来捍卫独立不屈的人格尊严,以自己的死来实现自己的崇高的政治理想。”(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142 页)参照这些说法,不难看出红卫的探讨是在丰富人们对屈原之死的认识。

方法是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手段。作者除了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之外,尤其重视“文本细读”。这种方法与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屈原史料有限,作品系年和归属权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文字训诂方面也多有抵牾,所以离开文学文本,似乎无法全面深入解读屈原和屈赋。

举例来说,第四章第一节“青壮年屈原的心路历程”和第二节“中晚年屈原的异常心理”主要依托的就是文学文本。在采纳了姜亮夫的作品编年之后,作者仔细探寻了屈赋中呈现的心理演变轨迹,应该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再譬如,第六章第一节在探讨屈原的生命意识的时候,作者认为“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又比常人和一般的艺术家更富于生命意识,对死亡的诗意表达也更为敏感、热情和富有想象力”。在引用郑晓江先生关于“超越死亡”的定义后,作者从《怀沙》、《思美人》、《惜往日》、《离骚》中找出若干内证,又从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补注》中找出参证,从而认为屈原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是不同于孔子和司马迁等人那种“立言”以“不朽”的传统价值观的。凡此种种,显示了作者对“文本细读”的高度重视。李欧梵在给“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所作“总序(一)”中的一段话很有意味:“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都从文本细读开始……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至少在现当代文学——向是‘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因此我得出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需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出其他理论招数出来。”(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总序(一),第 8 页)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我们不能割裂中国古代的文学事实去印证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正确性,同时也不能盲目排外,拒斥借鉴西方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比如,“文本细读”这种源自“新批评”的方法,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就有较广阔的借鉴空间。

总之,作者试图立足现存史料和文学文本,努力挖掘屈原的个性气

质和生命情态。可以说立论大胆,观点鲜明,方法新颖。在治学态度上,作者也比较小心谨慎,他强调指出:“我们着重从心理学维度描述屈原的人格特质和人格结构中悲剧性的层面,动态地展示其悲剧性的演变轨迹,并不是要贬损屈原的高洁人格;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屈原的性格弱点、心理冲突与困顿中的异常,把屈原当作一个‘人’而非‘神’来看待,这样我们就不会因其性格弱点、心理异常而否认其人格的光芒和人性的力量。我们意在抛砖引玉,呼请学界加强对屈原个性气质以及它对屈原创作影响的研究。我们的立场本乎一种‘了解之同情’,试图复现和还原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屈原,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式的屈原。”这种学术态度无疑是可取的。

第三,文笔洗练,间或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我一向主张中文系的学生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自己良好的文学感受和文字表达能力,所以我在培养研究生时也常常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应当说红卫近两年文字功夫有明显的长进。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无论是日常生活、上课还是写作,他总是激情飞扬。他的自序是由三篇短文连缀而成,表达了他对历史和诗学的看法,文笔精练,力图思辨,并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在自序写法上可谓别具一格。他的后记介绍了自己的学术之路和写作本书的一些背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此书的心态和屈原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是楚辞和屈原的文化人格重新激发或者唤醒了我在这个时代沉沦已久的理想主义激情,进而启示了我对理性与激情的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有时红卫也陷入忧郁和焦躁,激情之后有困顿,不过,这种情绪倒没有太多地影响他的文字表达。

当然,科学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它需要的是客观冷静的分析、推理、判断,但是在学术论著写作中偶尔稍作“放纵”,释放激情,追求诗意,也是能够启迪人的心智和增强阅读的美感的,又何乐而不为呢?作者在语言表达方面下了一些功夫,虽然还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有的段落有意追求骈偶之风,遣词造句也比较讲究,不少地方抒情色彩较浓厚。比如在第四章“中晚年屈

原的异常心理”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至《惜往日》，屈原开始痛楚地盘点自己的一生。美好的人生是怀揣着丰沛的生命力上路的，那时有多少天真烂漫的憧憬和一厢情愿的使命感，可是谗人嫉妒，障壅蔽隐，贞臣无由，在悲凉的放逐中走到今天，往古君臣遇合是那样的美好也是那样的无常，家国在‘背法度而心治’中没有理性地衰败着，冤屈的一生辜负了家族的期许，耗尽了内美和修能的青春光泽，生命的意志在辗转迁徙的流亡中磨损得粗糙如沙，最后一滴生命的灯油须将自尊与警世的希望点燃。”同样在第四章“双重焦虑与屈原之死”一节中，作者说：“忠君的梦魇如魔附体一般，在屈原的赤子之心中盘踞一生。但这一切终归虚妄，怀王全然没有将一个自高自大的臣子看得那么伟岸，楚宫台榭间缭绕的巫音和笙歌淹没了后宫怨妇的哭声，也淹没了屈子苦难的行吟。”这些段落在形象化的语言背后，暗含着作者对屈原的深刻理解，这种诗意的表达有时可能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甚至我认为，作者这种间或抒情的文风是和他所研究的对象甚为契合的，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和对象文本形成了和谐的共振，这恐怕也是学术个性的一种体现。

也许因为红卫是自己的学生，我对他的书有所偏爱，所作的评介难免“溢美”之嫌，但这绝不意味着本书没有缺点和问题，好在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独立地作出评价并提出批评，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帮助。我鼓励红卫进一步拓展他对中国古代辞赋的研究，因此他确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唐代律赋研究”，他正在紧张写作，若顺利的话，明年可能按期完成并参加答辩。我相信他的博士论文会比本书写得更好一些，因此也事先给他做“广告”，借此对他施加“友善的压力”（借用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语）。我对红卫的新作充满期待。

是为序。

2007年6月6日写于武昌桂子山寓所

自序

一个民族的文化长河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一如黄河、长江的九曲回肠，景象万千。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历经创生、成长、成熟、繁荣和转型，并在历史的各个时段表现出斑斓多姿的气象。而作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在中华文化史上正处于创生时期，它不仅表现出文化创生时代的元气淋漓，大气磅礴，而且散射着中华文化最云蒸霞蔚的光芒。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根源特质”，也就是说，这个伟大时代所创立的一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模式都如同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样，代代相传，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后世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正是在春秋战国文化的规范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不断从历史母体吸取滋养，使中华文化逐渐丰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品格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

按照通行的理解，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于这个民族的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考察中华民族的文史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我认为最显著的莫过于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和诗歌的崇拜、敬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思维和诗性智慧。

章学诚《文史通义》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按照章氏的理解，《六经》皆祖述先王之政典，《诗经》自不例外，后世著述皆祖述《六经》，说《诗》者亦然。其对历史和诗歌的充分肯定建基于二者“未尝离事而言理”，以故春秋末世，孔子也只能“述而不作”，至多也是以“微言”来晓“大义”，其说《诗》亦然，这种对历史和诗歌的敬畏深深影响了后世学术。

我们看到，后世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更多的是去写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的言和行，在事件中展示活生生的人的血肉，而鲜有对历史理性的概括，鲜有抽象的历史概念，我们的祖先惯于直观地体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构成了历史真正的主人，这就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甚至在诗学中，我们的祖先也创造性地发明了“诗史”这个词汇，把历史思维和诗性智慧放在了文化的地平线上。正是历史思维和诗性智慧的交融光芒照耀了中国人的心灵，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成果，锻造出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华文化品格。

然而，在研习屈原作品的时候，我有太多的迷惘和追问。是什么东西需要屈原用生命去捍卫？为什么屈原沉江以后有百年得不到历史的眷顾？为什么百年之后一经发掘，屈原就会如此的光芒万丈？为什么屈原的文化人格在中华文化长河中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乃至历久弥新？在面对一个史料如此匮乏的历史人物和中华民族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时，我们又将以何种方式解读他的文化人格？在屈原的求索意志和感性生命的感召下，带着对历史和诗歌本质的追问，我的思绪蔓延开来——

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

一只蚂蚁在路上看见一头大象，蚂蚁钻进土里，只有一只腿露在外面。小兔子看见了，不解地问：“为什么把腿露在外面？”蚂蚁说：“嘘！别出声，老子绊他龟儿子一跤！”

看到这则令人忍俊不禁的网络笑话，悲凉顿生。蚍蜉撼大树，螻蚁撼泰山，盘桓讲台既久，我常常萌生这种无助的感觉——面对三千年厚重的文学史，我能给予学生什么？我给予他们的是真实的文学的历史吗？我即使有能力复原秦砖汉瓦的色泽，还能复活唐宗宋祖们的生命吗？学生从书本和课堂上得到了真理吗？他们有追求真理和收获真理的快感吗？于是，工作并且检视自己的工作成了生活的常态，生活本身反倒是非常态。就像堂·吉珂德挥舞着锈迹斑斑的长矛与无形的风车战斗，悲壮而滑稽，我常常顾思想的阴影而自怜。

据说歌德读到堂·吉珂德与风车大战，失声痛哭：“这是世上最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悲观的浪漫主义者多迷惘。我的迷惘是从对历史的

反思开始的。

历史是什么？古今中外先哲世贤议论煌煌，不妨抄它几段：

司马光：“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张岱：“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误，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世界。”

梁启超：“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者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卡尔·波普：“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它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需要。”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天地人三才，人是宇宙的中间物；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是“历史的中间物”。秉天地之气，承历史之泽，顶天立地，航行于历史之川，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或民族的记忆和回忆，也是面对宇宙、面对人类或民族的灵魂。历史的幽灵无处不在，所以这份面对需要一种渐次的姿态：直面——敬畏——怀疑——挑战——求索——救赎。

米兰·昆德拉说：“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因之，庄子那份对自由的激情与火焰照亮了清冷的书斋：真理（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话说开头那个蚂蚁和大象的故事，还没完。

第二天，兔子看见整窝的蚂蚁排着队急匆匆赶路，问何故？蚂蚁答：“昨天有头大象被我们一兄弟绊倒，摔成重伤，我们给那丫献血去！”

穿行在历史的隧道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喜欢黑夜，是因为黑夜给我带来远离喧嚣的

静谧以及在静谧中的思绪翻飞和旺盛的创造冲动。因之，在旅途中，我也喜欢隧道，因为隧道瞬间就把我带入黑夜。

在幽暗明灭的灯光中，我常常留意于隧道墙壁剥落的砂石、斑驳的水渍、鲜活的苔藓，是什么让砂石剥落？水渍从何而来？苔藓生来就不需要阳光吗？骤然轰隆起来的机车声响伴随着疾驰而过的风声让心也会澎湃起来——单调的隧道让人纯净，隧道的单调中包孕着创造的简洁；隧道不是自然物，它是思想的产物；隧道要有亮光，或明或暗；隧道一定在山中穿行，漠漠平野不会得到隧道的眷顾；匆匆过客常常企盼着穿越隧道，走向光明；隧道是线性的，也是空间和时间的；隧道有落成的时刻，也有废弃或坍塌的那一天……因之，我习惯于不想驶出隧道，否则，思致会在阳光中蒸发，思绪会被隧道外的山峦牵走。

曾经在春江花月夜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神遇的目光洗涤了我的内心，也深深地震撼了我。“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那是怎样的大气磅礴啊！江水涌入大海的怀抱，娴静的大海荡漾着幸福面容，孕育着明月，孕育着，孕育着，终于潮水翻卷，创生的时刻来临了，伴随着一轮皎洁纯净的明月被托举出海面，自然的音响不是轻盈的小夜曲，而是奔涌的交响乐，那是创造的伟力，何等的元气淋漓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正是行进在历史的隧道中萌发的“夔绝的宇宙意识”吗？何等殷切的追问！何等纯净的忧伤！

在我看来，历史就是一条幽深的隧道，它只是人类修筑的路中的片断，除了隧道，还有更多的阡陌，更宽广的大道，还有小径，还有即将成为路的山林，就像人类除了历史之外，还有哲学，还有科学，还有文学艺术等等，更重要的，还有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有众多的路通往人类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即使是人类之路的片断，隧道也是连接路与路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类的心灵之路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因而历史还需要不断地建构，人类需要西西弗斯的精神。